

发展传播学批判:传播学本土化的再思考

□ 胡翼青 柴 菊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22(2013)01—0012-4

【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勒纳为代表的美国发展传播学一度很受部分中国学者的青睐,认为这是中国传播研究本土化的重要方向。勒纳的发展传播学属于后殖民理论,有着强烈的冷战思维,渗透着强烈的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但却成为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的起点。就这一理论而言,中国学者的“对号入座”体现了我们在学术研究上的功利主义,这种功利主义实际上消解了中国传播研究者的主体性。

【关键词】发展传播学 勒纳 本土化 主体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勒纳为代表的美国发展传播学一度很受部分中国学者的青睐,认为这是中国传播研究本土化的重要方向。有研究者提出发展传播学“在中国传播学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并成为传播学本土化的一个重要切入点。”^①然而,在西方批判学者的眼中,勒纳显然属于后殖民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有着强烈的冷战思维。在国内也早有学者对他口诛笔伐:“发展传播学是在世界分为南北贫富两极的历史格局内以研究第三世界传播与发展问题为对象,以维护这种格局即资本国际统治为宗旨的理论。它实际上也是从殖民理论脱胎而来的。勒纳曾宣称,西方模式具有世界的通性,由此出发,他把现代化简化为直线的过程,认为第三世界的发展可以不顾传统。”^②一个充满着美国学者关于世界的想象的后殖民理论,怎么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的起点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当然首先要回到勒纳。

一、回到《传统社会的消逝》

要回到勒纳的《传统社会的消逝》,就要从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应用局对中东地区的调查谈起。该调查由拉扎斯菲尔德主持,始于1950年9月,以问卷形式在中东七国测量中东受众的心理特征与背景特征、媒体消费习惯、对外国媒体的接受程度等等。这七个国家分别是:希腊、土耳其、黎巴嫩、约旦、埃及、叙利亚和伊朗。调查项目的主要运作包括:获取数据、记录进程、克服政府行政压力、协调政府、访员和受访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因为该调查涉及范围较广、遇到的问题也较为复杂,因此这次调查也被称作是“首创性调查”。^③当时勒纳也参加了这个项目,他于1951年上半年介入了土耳其的调查。调查全部结束以后,勒纳有机会于1952年7月到1953年6月回到应用社会研究局重新整理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并根据应用社会研究局的要求对这些数据进

行理论综合。^④而最终产品就是《传统社会的消逝》一书。在这部书中,勒纳极具想象力地构建了发展社会学与发展传播学的理论框架。

勒纳的理论框架可以简要描述如下:首先,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划分为一对二元对立的观念,因此在他看来,现代化或者发展问题就是一个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所谓的传统社会一端,在勒纳看来多是政治专制、城市化程度低、识字率低、社会的流动较少、大众传媒发展水平不高的国家,而现代社会的兴起,则伴随着农村经济走向城市经济、文盲社会走向信息社会、专治政体走向民主政体、人际沟通走向社会流动与大众传播。

据此,勒纳建构了两个数据指标体系。第一个指标体系是社会发展指数,这一指数由城市化程度(经济水平)、投票率(政治参与度)和识字率(文化水平)三个可操作性指标构成。第二个指标是媒介发展指数,由报纸发行量、广播普及程度与电影院座位数三个可操作性指标构成。然后他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两者之间有着高度的正相关关系。

勒纳便由此认定,大众传播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影响:“在任何一个地方,识字率的提高往往会增加传媒的影响,而日益增加的传媒影响又‘伴随着’更广泛的经济参与(人均收入)和政治参与(投票选举)……实际上,世界各大洲所有正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都重复出现……相同的基本模式。”^⑤为了进一步在微观层面说明这个问题,勒纳又提出了一个“移情”的概念,认为移情能力是社会变革和现代化人格塑造的原动力,而传播媒介则是刺激传递“移情能力”的最好工具。正是大众传播累积性的传播对社会成员潜移默化地发挥“移情”作用,才促使人们逐步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积极主动地投入社会变革。勒纳将大众传播形象地称之为国家发展中的“奇妙的放大器”。

从今天传播学家的视角来看,勒纳的研究简直从任何

【作者简介】胡翼青,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融合应用实验室研究员,副教授。

柴菊,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

【基金项目】本课题受南京大学青年基金项目“高校传播学科科研模式研究”经费资助。

一个方面都不是必然成立的。实证研究者会认为他的指标体系过于粗糙,概念也不够精确,用“移情”等无法经验测量的概念去解释数据,更是有违基本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原则,有太多精神分析的痕迹。更为正宗的迪尔凯姆主义者干脆认为,将传播系统与社会系统互为因果的关系(相关关系顶多只能证明互为因果)解释为传播为因,社会为果,则有违因果律的基本逻辑。而批判学者则更不能认同他,首先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立,这本身就是个不成立的前提,而其指标体系的设置则有循环论证的嫌疑。如果是多元文化论者,则会直接认为这种学说是种族优越论的当代变种,因为他眼中唯一的衡量标准就是美国中心主义。而在笔者看来,这一理论其实就是一个粗劣的技术决定论假说。

然而,出乎人们的意料是,勒纳的研究受到了当时许多美国传播学家的认同,甚至包括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及其阵营各位大佬的认同。勒纳因此一举奠定了发展传播学开创者的地位。施拉姆的媒介角色理论,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包括英格尔斯家喻户晓的关于传媒与人的现代化的研究,都受到了勒纳理论的影响。

此后,发展传播学沿着勒纳等人的路径,将发展问题视为现代化在落后地区的扩散问题,形成了发展传播学中第一代范式,也被科林·斯巴克评价为主导性范式。

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主导性范式就面临着众多批评并因此做过各种修正。最主要的批评是,主导范式忽视了社会结构对发展传播效果的影响,同时主导性范式在实践中也没有取得所期待的效果。“主导范式形成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二元对立,过于激进的发展变革可能引发社会动荡,使得反现代化的声音重新得到相应,反而破坏了通向现代的可能性。”^⑥一时间,对美国中心主义和媒介中心主义的批判此起彼伏。以施拉姆为代表的保守派学者也开始意识到早期发展研究包括发展传播学研究存在的两个突出问题:“其一是把发展问题等同于一个国家的西方化;其二是将现代化看作是一个指日可待的社会发展过程。”^⑦另一些人认为现代化带来的民主和自由对于这些落后国家的经验而言会遭到排斥,西方想使中东或是其它国家努力实现现代化,更容易失败。甚至有人提出,这些落后的国家注定要落后即“失败国家”。美国著名的保守派代表、政府智库亨廷顿说:“现代化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⑧在亨廷顿看来,现代化会很容易带给后殖民国家带来政治上的动荡,这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不应该推动这些国家去实现现代化,而是应该去阻止这些国家现代化。

然而不管人们怎么批评,谈到现代化问题,最有影响力的发展传播学理论仍然是勒纳的理论。一说到现代化和现代性,人们会本能地讨论传媒所扮演的角色。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传媒与社会发展,传统人格与现代人格,东方与西方……这是现代研究中怎么都无法改变的基本准则和框架。为什么勒纳这个简单而粗糙的社会科学解释模型会得到那么多美国学者的追捧呢?它又如何成为一个研究领域的主导性逻辑呢?

二、发展传播学的历史语境

笔者认为,一位学者的研究风格会受到他所在环境的

深刻影响。而他之所以受到推崇,一定是因为他代表他所在的学术共同体表达了他们的共同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他们的共同焦虑与社会存在状态。

那么勒纳及其学术共同体是在什么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呢?勒纳的学术活跃期集中在1950年和1969年之间。在此之前,他在美军服役,他在联合远征部队战略总部的指挥下,作为宣传人员为心理战部效力。二战后,他退伍回到纽约大学专注于研究宣传学研究,写出了他关于二战中盟军的宣传效果的博士论文。1949年他还出版了《反对德国的心理战》一书,介绍在德国的心理战的经验。虽然与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等战时宣传研究的活跃分子相比,他属于晚辈,然而在军队的经历使他与这些前辈学者在政见与学术视野方面有着共同的旨趣。于是,勒纳很快便被这个御用社会科学家“俱乐部”所接纳。关于这一点最明确的证据是,他除了参与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应用局的项目外,还与拉斯韦尔有过愉快的合作。1945至1952年中期,获得博士学位的勒纳在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获得了一个职位,参与由卡内基基金会资助的重要项目“对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革命以及发展进程”。在这里,勒纳与该工程的领导人拉斯韦尔“第一次亲密接触”。

不过与前辈们研究战时宣传的二战背景不同,勒纳的学术活跃期正好遭遇了美苏冷战大幕的拉开,当时的美国政府对战争宣传的关切度已大大下降,新的任务摆在了勒纳这一代学者的面前。1948年,国家安全委员会受杜鲁门总统指令起草了NSC20号系列文件,明确了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基础就是施行遏制苏联的基本战略。以此为指导,美国在全球展开了一系列旨在实现地缘政治平衡的行动:一方面,在欧洲展开马歇尔计划,以帮助欧洲战后恢复重建,使西欧趋于稳定,形成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以重建对抗苏联的联盟。另一方面,加大了对一批新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干预,防止他们倒向社会主义阵营。摆在美国政府面前的任务既明确又艰巨,需要得到社会科学家的的大力支持:其一是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了解第三世界国家并引导它们接受美国的立场;其二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寻找规律,在与苏联的心理战中取得上风。

于是,美国政府开始意识到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并从各个方面推进着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为了更好地实施冷战战略,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从以下两方面对社会科学提供了支持,并因此将他们变成一个为政府服务的学术共同体。

其一是资金。政府以及私人的组织,如卡内基公司、福特基金会,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战后为这些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增强各大学的“区域研究”力量,引导社会科学家从事敏感地区的地缘政治学研究。美国军方、情报和宣传部门斥巨资用于心理战计划,雇佣大批专家学者,使学术研究直接服务于国家政策。许多社会学家、传播学家都被招至麾下,为美国与苏联进行心理战方面的对抗进行服务,从1945—1960年美国军方、情报和宣传部门提供了所有大型传播研究的主要资金。^⑨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美国政府每年要花费700万到1300万用于传播学相关研究。^⑩因此,有研究者认为,美国的社会学,特别是传播学研究从诞生之初就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心理战的影响。甚至有研究者认为:“没有美国的心理战计划,就不会有后

来成为显学的传播学”。^⑩

其二是研究机构。在较为充裕的资金的支持下,一些大型的研究中心成立,以这些研究基地为依托,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从事战后民族国家的重建、社会变迁以及不同类型的国际援助的研究产生、供应知识,以服务于当时外交政策的研究。勒纳所在的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其背景就颇耐人寻味。该中心在整个50年代的研究重点就是“第三世界现代化或经济发展对美国的可能威胁”。表面上该中心是由福特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的,但是其背后的资金来源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中情局资助出版了该中心公开的和秘密的研究成果,“基金会、政府部门、大学共同产生了一种机制安排以产生现代化理论。”^⑪中心的建立者马克斯米利肯受命用中情局资助的经费,招集了一个包括经济学、社会学、传播学、人类学、政治科学等诸多领域的专家,组建多学科的团队以研究第三世界现代化。后来许多重要的社会与经济专家,例如沃尔·特罗斯托(经济学家)、爱德华·希尔斯(社会学家)、丹尼尔·勒纳(传播学)、克利福德·格尔茨(人类学)以及白鲁恂和伊惜尔·珀尔(政治科学)均在此列。研究中心的重要特色就是模仿了如同发展原子弹计划的“曼哈顿计划”的机构设置,重视解决政策制定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最主要的成就是为日益扩大的对外援助提供智力支持,并且提供了一系列,例如“技术转变”,“起飞”以及“自助”等影响当时美国肯尼迪政府的外交政策话语。自1958年勒纳受邀加入该中心任社会和国际传播学教授,研究中心用从中央情报局以及福特基金会获得的基金资助他从事对后殖民地国家的研究。而《传统社会的消逝》就是勒纳对于中心资助最佳回报。勒纳的现代化理论研究正是达到了当初设立研究中心的最初目的:使社会科学家群体将自己娴熟的社会科学分析技巧都带入了为政策服务的研究工作当中,按照政策需求从事与政府为导向的相关学术研究。

当然,勒纳也是美国当局需要的那种学者,他确实为美国的海外霸权立下了汗马功劳。正如赫曼特·沙阿评价的,勒纳的理论如此精巧是因为他“把地缘政治学、社会变化、认知过程、大众媒体如此完美地混合在一起,组合成了提供给后殖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理论”。^⑫

有两种观点会对我们的知识社会学背景提出质疑:其一是即使美国当局存在着上述对学者的规训,秉承着价值中立的学者群体也不一定会按照当局的理念来型塑自己的研究;其二是即使任何理论都具有意识形态的背景,两者间也可以通过时空的脱域而分离。而事实上这两种判断都是有问题的。

前一种判断是不了解美国的国情和当时的社会科学家。美国社会科学家从来就认为学术研究与为国效力是没有矛盾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二十年里,许多美国社会科学家……认为在其学术研究和为解决战略问题而创造知识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矛盾。……他们寻求自己的学科获得更精确、更科学的地位,这可以与遏制共产主义——它在地缘政治和道义方面都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努力并行不悖。”^⑬以所谓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为代表的社会科学家圈子,其实根本不用规训和招安,他们就是当局的智库。美国式的价值中立,从来不是韦伯说的那种学

术与政治间应保持的价值中立,而仅仅只是用自然科学式的方法研究社会,而后者则是最容易被统治阶级招安与收编的。

后一种判断显示了对知识价值的无知。没有任何理论可以摆脱意识形态的向面;也没有意识形态可以摆脱理论的向面,尽管它们不是同一事物。意识形态会以原则和信条的方式潜入理论并型塑着理论,它构建着某一理论的深层结构(这种结构是非理性的和先在的)。比如心理战的观念在整个美国学界强化了一种观念,即把大众传媒单纯看成是社会控制的工具,而传播就是用适当的方式把任何信息传输出去以实现意识形态、政治和军事目标。所以美国主流传播学里没有批判思想的空间,也没有协商性多元文化的空间,有的只是美国中心主义的优越感和赤裸裸的示范。而勒纳和他的发展传播学理论生来就无法摆脱这一先在的前提。因而,发展传播学只能被称为有一点理论和专业色彩的意识形态。

发展传播学本土化批判

从2011年开始,有一批国内的年青学者再次把传播研究本土化问题的讨论搬上了国内的学术期刊。也许有人会质疑这种提法的正当性,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讨论毫无意义,然而这种讨论绝不可能是最后一次,而且这种关于本土化问题的焦虑与讨论将会越来越密集。

在《传播研究本土化路径的迷失——对“西方理论,中国经验”二元框架的历史反思》一文中,本文作者检讨了我们在传播本土化进程中对西方理论的态度:“事实上,与我们对中国经验的态度一样,我们对于西方传播理论的态度,几乎可以说是轻佻的,随意地把西方理论与其语境剥离开,并不假思索地套用到所谓的‘中国经验’之上,或是直接类比,或是移花接木,完全不顾二者之间的互动,是中国传播研究者最常见的手法。这种处置方式将西方理论鲜活的内容变成了空洞的形式。”^⑭这么做立即造成了两方面的后果:

一方面,西方的理论因此被真理化、客观化或标准化。这一过程使研究主体失去了学术思考的正确方式,陷入了评判西方理论或对或错的二极思维中。西方理论中潜藏的丰富的学术张力因此被消解,并因而成为理论教条。

而另一方面,研究主体成为了理论的搬运者而非创造者。而这一搬运的过程不但丢开了理论的系谱和历史语境,也丢开了理论背后的意识形态取向。这样一来的第一个后果是,理论成为生硬的因果关系,对现实的解释往往与现实脱节。而第二个后果则是使西方意识形态摆脱其理论,而直接成为研究主体的价值立场,从而完成了对研究主体价值标准的潜移默化的思想殖民,造成了内在的东方主义。

勒纳的发展传播学在中国传播学界的推广曾经被看作是中国传播理论本土化的重要方面。它也确实是个成果丰硕的领域。正因为如此,它可以作为一个范例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的传播研究总是在西方的意识形态语境中挣扎,总是以西方的标准为自身的标准。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江苏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张学洪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便已经采用勒纳和英格尔斯的视角,对苏北地区传媒与人的现代化关系进行了

大规模的定量研究。这些成果最早于 1986 年就已经在所里的内部刊物上发表,后有部分内容又被收录入陈崇山的《中国传播效果透视》一书。根据笔者 2008 年对张学洪先生的访谈,当时的想法非常简单,就是为中国的“四化”建设提供一些有用的数据和对策。也是在那段时期,中国社科院与复旦大学分别有学者在学术刊物上开始介绍发展传播学理论,代表作有袁路阳的《传播事业与国家发展》(《新闻学刊》1986 年第 1 期)和潘玉鹏的《发展传播学简介》(《新闻大学》1989 年冬季号)。

从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开始,发展传播学渐渐开始变得热门起来。第一个新闻学的国家课题“新闻事业与中国现代化”在 1992 年前后结项,以课题组副组长范东生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成为介绍发展传播理论的重要基地,在复旦大学,裘正义 1993 年出版的博士论文《大众传播与农村发展》作为国家课题《传播与中国城乡现代化》的结项报告,在当时很有影响。陈崇山的《媒介·人·现代化》更是被看作是 20 世纪 90 年代发展传播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进入 21 世纪,发展传播学领域每一年都显示了惊人的知识生产能力,从论文到专著的数量,从课题数量到经费投入都相当可观。思辨、质化、量化的方法得到全面运用,各种选题,从城市务工人员到留守儿童,几乎全被涉足。

然而,与美国的发展传播学一样,在大量研究了中国各个不发达地区的情况后,中国的学者并没有在理论上超越勒纳半步,他们的结论几乎是雷同的,完全拘束于勒纳的框架之内,而且研究带给他们的困惑远远多于问题的答案。提出和实施的大量发展传播学对策,并没有改变不发达地区依然落后的现状,传媒的普及与使用既没有提高当地相对的现代化水平,也没有培养出什么现代化的观念。相反,现代传媒的普及为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带来了更多难以解决的复杂社会问题。大家开始意识到,美国为我们设定的目标不是我们的文化能够承载的,美国的现代化也不是现代化的唯一方式;城市和东部的生活方式也不是农村和西部的文化可以承载的,城市化和东部化也不是我国落后地区发展的唯一取向。简单的因果推断,在实践中只会造成更多的断裂与矛盾,导致社会的动荡和失序。于是,我们不禁要问,在发展传播学本土化的过程中,出了什么问题?

目前,我们能清醒地看到的弊端是,我国传播研究主体在理论本土化过程中那种主观能动性的缺失。美国人的后殖民理论被不加批判地当作适用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理论,西方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和支配性显现无余。不作深究地对西方理论进行引介,在没有切身体验和反思的情况下就一知半解地运用他人的理论,当然要被他人的意识形态所控制,更何况所遵从的理论本身就是强烈的意识形态知识。

从发展传播学这一个案可以看出,中国传播理论本土化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研究主体缺乏批判意识的精神,缺乏探索的主体性,不加分析便自动地归属于西方理论的话语霸权并自觉地受其支配。就这样,研究主体本身被异化了。“在对象建构的过程中,他们表面上是主人,但实际上正是透过他们,社会、经济或政治意识形态等非学术力量涌入进这些对象以及他们的研究中,进而渐渐支配了社会科学场域。”^⑩邓正来的观点,用来说明美国传播理论如何殖民中国的研究主体同样贴切。所以笔者仍要强调:“传播研究

的本土化应当是一个多元化的学术自觉,它总体来说可以被形容为中国学者在与西方学术对话过程中的那种批判意识。这种学术自觉恐怕是不能被丢弃的,它决定了我们这些非主流学术话语的学者们的独特研究立场。它可以警醒我们不要落入西方话语霸权的圈套,要将学术研究与本土问题的复杂性和鲜活性紧密结合起来。唯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成为传播研究的主体,才能真正推进中国的传播研究本土化。■

参考文献与注释:

- ①徐晖明:《中国发展传播学研究状况》,《当代传播》2003 年第 2 期。
- ②支庭荣:《由盛而衰的发展传播学》,《新闻大学》1996 年冬季号。
- ③ Umaru Bah, Reading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Cultural Studies, 2008, 22(6).
- ④从纷乱的数据中寻找理论综合,是当时美国传播学及社会科学研究的时髦。应用社会研究局当时的领导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都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两位学者都将从经验数据中提取出相应的中层理论作为研究的重要旨归。
- ⑤L. Daniel Ler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Free Press, 1958, pp46.
- ⑥科林·斯帕克斯:《全球化、社会发展与大众媒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7 页。
- ⑦参见胡翼青:《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1 页。
- ⑧S·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1 页。
- ⑨William elli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 behavioral science, special issue of th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964, 7(9).
- ⑩James Burnham, containment or liberation?, the new York, John Day, 1953, pp188.
- ⑪许静:“心理战”与传播学——美国冷战时期传播学研究的一大特色》,《国际政治研究》1999 年第 1 期。
- 常贝贝:《冷战初期美国的海外图书馆项目与心理宣传战》,《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3 期。
- ⑫伍静:《中美传播学早期的建制史与反思》,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1 页。
- ⑬Hernan Shah, The production of modernization: Daniel Lerner, mass media, and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8.
- ⑭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 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3 页。
- ⑮胡翼青:《“传播研究本土化路径的迷失——对‘西方理论,中国经验’二元框架的历史反思”》,《现代传播》2011 年第 4 期。
- 朱晓军:《科学发展观对传播学本土化路径选择的现实意义——重申发展传播学的理念》,《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7 年第 12 期。
- ⑯邓正来:《研究与反思: 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 页。



冬(国画)

李志天